

《武經總要》所引《孫子》研究

李新偉

摘要

《武經總要》作為中國古代第一部官修軍事百科全書，大量引用了《孫子》原文。這些引文不但可以解決一些校勘問題，還為版本學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據，為恢復《孫子》原貌提供了珍貴資料，並可用來糾正古今許多相關訛說。同時，這些引文在很大程度上還體現了北宋孫子兵學的發展狀況，並折射出這一時期軍事思想的某些積極變化。因而，《武經總要》在孫子兵學發展中具有很高地位，其中的引文對《孫子》學的研究起到了重大作用。

一、前言

北宋立國以來，長期推行「重文抑武」的國策，以致康定年間（1040-1041）「天下承平，人不習兵。元昊既叛，邊將數敗。」^[1]大宋王朝竟屢敗於猝爾小邦，這是傳統士大夫們難以接受的現實，於是社會上掀起了「人人言兵」

關鍵詞 (Keywords)：《武經總要》；《孫子》；引文；文獻學；軍事思想

Wu Jing Zong Yao ; *Sun Zi* ; Quoted Passage ; Philology ; Military Idea

李新偉：武警北京指揮學院講師；Email: general76@yahoo.cn

[1] 宋·趙希弁，《郡齋讀書志》（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74冊，後志，卷二〈王皙注孫子三卷〉，頁415。

的熱潮。作為「百世兵經」的《孫子》，再次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孫子兵學逐漸勃興，「本朝注解孫武書者，大抵皆當時人也」。^[2]《武經總要》（以下簡稱《總要》）作為當時編修的兵學巨著亦大量引用了《孫子》原文、注文，並加以闡釋。

慶曆三年（1043）至七年（1047）間，宋仁宗針對西夏之敗，「深惟帥領之重，恐鮮古今之學」（《仁宗皇帝禦制序》）特命曾公亮、丁度等人編纂《總要》一書。該書作為古代歷史上第一部官修軍事百科全書，分前後兩集，各二十卷，凡四十卷。前集一至十五卷為「制度」，十六至二十卷為「邊防」；後集一至十五卷為「故事」，十六至二十卷為「占候」。

《總要》在「前集卷一至卷十五，大量引用《孫子兵法》的文字，各節內容多是結合新的經驗分條闡發《孫子兵法》的軍事原則。其後集故事卷中所設子目多以《孫子兵法》之語為題。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多方以誤之》等，然後舉例詮釋，體例仿佛《通典·兵典》而有所發展。」^[3]某種程度上，此書是以《孫子》引文為基礎而編纂成書的。

據筆者統計，全書共出現「兵法」79次，所引內容大部均屬《孫子》十三篇原文；「孫武」18次；「孫子」18次，其中指「孫臏」者3次。書中單十三篇原文就達3,242字，僅次於《太平禦覽》，略等於《通典》，大大多於《長短經》及其它宋代以前古籍。此外，它還保存了相當數量的佚文，除少部分為十三篇內容外，多數可歸於雜篇。至於大量注釋和闡發，更是難以統計。這些對於後人展開相關方面研究均具有重要意義。

二、文獻學價值

現存《孫子》主要有四個版本系統，即曹注本、武經七書本、十一家注本和漢簡本。曹注本是三國時期曹操所作，為現存最早的《孫子》注本系統，目前所存最早版本為影宋本；《武經七書》是北宋元豐年間宋神宗命朱服、何去非等人校訂編纂的中國古代第一部軍事教科書，包括《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七部著名兵書，其

^[2] 同註 1。

^[3] 於汝波著，〈歷代研究〉，《孫子兵學大典》第 2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63。

中的《孫子》部分主要依據曹注本修纂而成，是後世流傳最廣的版本系統，現存最早版本為南宋刻本；十一家注本是宋代吉天保所輯，集合了曹操、孟氏、李筌、杜佑、杜牧、陳皞、賈林、梅堯臣、王皙、何延錫、張預等人的注文，現存最早版本為南宋甯宗刊本；漢簡本，1972年出土於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其與上述三種傳世之本相比，更接近《孫子》原貌，但殘損較大。

由此可見，在《總要》產生之前，曹注本和不完整的十一家注本就已廣泛流傳。武經七書本脫胎于曹注本，產生於《總要》之後；漢簡本屬於現代考古發現的版本。按照時代特徵，本文以曹注本和十一家注本為中心對其引文進行研究。

(一) 校勘學價值

據筆者統計，曹注本和十一家注本所異文字共有84處，136字。而《總要》所引原文與這些異文不同者多達46處，其中與曹注本異者21處，29字；與十一家注本異者19處，30字；與兩者均異者4處，12字。這些異文，除了說明曹注本與十一家注本差異巨大之外，也反映了《總要》在編修過程當中並非完全遵循一家之說，而是相容並蓄，擇優而從。這與後來《武經七書》編纂時宋神宗「詔《孫子》止用魏武帝注，餘不用注」^[4]，專從一家之言的情形是大為不同的。這些異文的存錄還為今人展開校勘學相關研究提供了豐富資料。

首先，《總要》保存了大量可供校勘訛誤的資料。如前集卷三，《敘戰中》有：「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此語見於《孫子·兵勢》篇，與曹注本同。十一家注本「本」為「卒」。按照文意對偶原則，「利」與「本」相對，較之「利」與「卒」更貼近本義：在利益的誘導下，以根「本」擊敵，才能最終使「任勢」取得成功，打敗敵人；而「卒」字，則無法體現這層含義。故筆者認為曹注本為優，而《總要》的引文有力地佐證了這一點。

又如前集卷四，《孫子·行軍》有：「殺馬食肉，軍無糧也。」此語見於《孫子·行軍》篇，與曹注本同。十一家注本「殺」為「粟」。「殺」，《說文·殳部》雲：「戮也。」「粟」，《說文》雲：「嘉穀實也。」該字無「殺戮」之義。故當以曹注本為是，十一家注本為非，《總要》所引亦為善。

再如前集卷四，《察敵形》有：「諄諄翁翁，徐與人言者，失眾也。」此語見於《孫子·行軍》篇，與十一家注本同。曹注本「翁翁」為「諄諄」。

[4]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三百四十一，頁8198。

「翕」，《說文·羽部》云：「起也。」段玉裁注：「翕從合者，鳥將起必斂翼也。」引申為「聚集」義，《方言》云：「翕，聚也。」《爾雅·釋詁上》亦云：「翕，合也。」張預注曰：「翕翕，聚也……言士卒相聚私語」。古無「讒讒」二字。可見當以十一家注本為是，曹注本為非，《總要》引文保存了珍貴資料。

其次，《總要》提供了許多可供校勘衍、倒的資料。如前集卷一，《選將》有：「所謂五危者，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此五者用兵之災也。」此語見於《孫子·九變》篇，與曹注本同。十一家注本為「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比曹注本衍五個「也」字。曹注本、《總要》言簡意賅。

又如前集卷二，《教平原兵》有：「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此語見於《孫子·勢》篇，與曹注本同。十一家注本為「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比曹注本衍兩個「也」字。曹注本、《總要》較為簡潔。

再如前集卷一，《將職》有：「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以用。」此語見於《孫子·地形》篇。十一家注本衍一「也」字。曹注本則作「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以用也」，「愛而不能令」與「厚而不能使」文序顛倒。此句前為「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從前後邏輯上分析，曹注本文序順暢，保存了《孫子》的原貌；而十一家注本等則進行了改易，使該句本身更為連貫，更符合時人的語言習慣。《總要》與《太平禦覽》、《通典》、《長短經》引文均同，有力地佐證了這一點。

再次，《總要》存錄了較多文字差異的資料。此例甚多，如前集卷三，《敘戰上》有：「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此語見於《孫子·作戰》篇，與十一家注本同。曹操、李筌注亦曰：「未睹者，言其無也。」而曹注本「睹」為「覩」。《說文·目部》云：「睹，見也。覩，古文從見。」「覩」是「睹」之古文。《總要》、十一家注本比曹注本晚近千年，同為「睹」字，並非訛誤。

又如前集卷九有：「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此語見於《孫子·九地》篇，與十一家注本同。曹注本「預」為「豫」。「豫」，《玉篇·

象部》語：「豫，逆備也。或作預。」有「預備」之義，故通「預」。

再如前集卷十，《攻城法》有：「踴土距闔，又三月而後已。」此語見於《孫子·謀攻》篇，與十一家注本同。曹注本「闔」爲「堙」。《說文通訓定聲·屯部》：「闔，段借爲堙（堙）。」二字相通。

可見，《總要》的引文佐釋了曹注本、十一家注本差異的合理性。

通過以上對勘資料可得如下結論：其一，曹注本較善、較爲節略，符合《孫子》的原貌，與漢簡本比較接近；而十一家注本集合諸家《孫子》之注，進行拼合，較爲符合時人語言習慣，容易理解，有不少勝於前人之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中就包括很多衍文。其二，虛詞以及通假、異體字在諸本差異中佔有較大比例，字句的實際意義差異不大。

要之，《總要》所引《孫子》原文的校勘價值較大。正如李零先生在《孫子》十三篇的校勘問題時所講：「《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群書治要》、《初學記》、《通典》、《長短經》、《太平禦覽》、《武經總要前集》……這些都是校勘《孫子》最重要的材料。」^[5]

(二) 版本學價值

《總要》引文中保存了較多的《孫子》版本資料，這爲版本學進行相關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據。

如前集卷九，《九地·重地》有：「令發之日，士坐者涕流或作沾襟，偃寢者涕交頤。」此語見於《孫子·九地》篇。曹注本、十一家注本及武經七書本「流」均作「霑（沾）」。這種情況反映了當時《孫子》版本較多，「流」是當時通行版本的用法；另外也說明《總要》對待資料的來源頗爲慎重，並不局限於時人的通俗看法，重視不同的版本之間的差異，擇善而從，並存疑於後，使這些內容得以存錄下來。

前集卷九，《九地·輕地》中亦有孫武回答吳王之言：「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高或作名城，無由其通路。」此句爲《孫子》佚文，《通典》、何延錫注中有此文，「高」均作「名城」。

另外，《九地·死地》也有：「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並氣一力，或攻兩旁或作奇，震鼓疾噪，敵人亦懼，莫知所當。」此語亦爲《孫

[5] 李零著，《〈孫子〉十三篇綜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417。

子》佚文，《通典》、何延錫注中有此文，只是《通典》中「旁」為「傍」。「傍」同「旁」，《廣韻·唐韻》：「傍，亦作旁。」此例也可與上述兩例同歸一類，只是當時流行版本中用「旁」，而編纂者卻認為某異本中作「奇」更為合理。

可見，《總要》比較注重版本的選擇。遺憾的是後人非但沒有注意到這一點，而且在對《總要》的研究過程中還忽視了對其版本資料自身的運用，以致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訛誤。

比如在考釋《孫子·九地》中的「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時，《孫子會箋》認為：「《總要》謀誤作謀」^[6]，「迂作遷」。^[7]又如在注解《孫子·火攻》中的「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時（按：十一家注本），《孫子校釋》則認為：「《總要》變誤作便，以數守之漢簡本及其它各本皆同此，僅《總要》作以攻之，當是缺誤所致。」^[8]

《孫子會箋》亦認為：「《總要》作以攻之，且與上聯繫，非是。」^[9]上述相關考釋，均系採用四庫全書錯文所誤，而明正統刻本、弘治刻本、嘉靖刻本、萬曆金陵書林唐富春刻本等版本的《總要》內容均與《孫子》原文相同，並不存在訛誤。事實上，現存《總要》版本中當以明正統刻本、弘治刻本、嘉靖刻本、萬曆金陵書林唐富春刻本等較早、較善；而四庫全書本較差，其中「抄寫錯誤，或以意為之」者，常有之。

(三) 輯佚學價值

《孫子》原本「八十二篇。圖九卷。」^[10]數十萬言。其中十三篇多講戰略、戰術，是其核心部分。因此，魏武帝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11]，單列十三篇於世。十三篇問世後不久即為師旅所稱。相反，餘篇長期以來由於多講「春秋末期的治軍之法，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而逐漸被淡漠、遺忘」^[12]，今人難

[6] 楊炳安著，《孫子會箋》（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頁170。

[7] 同註6，頁171。

[8] 吳九龍著，《孫子校釋》（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頁228。

[9] 同註6，頁171。

[10]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三十，頁1756。

[11] 宋·王應麟，《玉海》（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946冊，卷一百四十〈孫臏兵法〉，頁692。

[12] 王家祥，〈大通上孫家寨漢簡孫子研究〉，《文獻》，1：1（2000.1），頁40。

以詳曉。唐宋時期，諸書對《孫子》徵引十分盛行，《總要》亦屬其列，在其引文中保存了許多佚文，這為我們輯佚、恢復《孫子》原貌提供了珍貴資料。

如前集卷二，《教平原兵》有「三令而五申之」。銀雀山出土的漢簡《孫子》佚篇《見吳王》中提到「三告而五申之」。《尚書·泰誓》孔穎達疏、《史記》卷六十五《孫子吳起列傳》均為「三令五申之」。今楊炳安的《孫子會箋》，李零的《〈孫子〉十三篇綜合研究》，徐勇的《先秦兵書佚文輯解》（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著作中對此均有輯錄。故此句當屬《孫子·見吳王》篇佚文。

又如後集卷十二，《死地勿攻》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銀雀山漢簡《地形二》篇提及「右負丘陵，左水前澤」。「負」、「背」義通。《釋名·釋姿容》：「負，背也，置項背也。」《廣雅·釋詁四》：「背，負後也。」二者均有「依靠」之意。《孟子·盡心下》：「虎負嵎，莫之敢撓。」朱熹注：「負，依也。」「前左水澤」為宋人對「左水前澤」的改易，以便於時人理解。《史記》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資治通鑑》卷十、《玉海》卷一百四十二均有此語，「背」作「倍」。《周易》孔穎達疏作「背」。此語屬《孫子·地形二》篇文佚文。

再如前集卷九，《雜敘戰地》有「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據山險，擇利而處之，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為之奈何？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采。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固，則奪其所愛也。」（按：據明正統刻本、金陵唐富春刻本）《通典》一百五十九卷有此文，「擇」為「常」，末尾多出「敵據險阻，我能破之」兩句。《太平禦覽》三百三十一卷亦有此文，轉引之《戰國策》，「敵人保據山險，擇利而處之」作「敵人保山據險，擅利而處」，「其固」作「其故」。今人著作中對此均有輯錄。^[13]此佚文屬於孫子後學者所著，以問答形式來解釋《九地》篇相關內容。諸如此類者，在前集卷九《九地》中關於「散地」、「輕地」、「爭地」、「交地」、「衢地」、「重地」、「圯地」、「圍地」、「衢地」、「死地」的論述均有大量存錄。

[13] 具體內容可參見：楊炳安，《孫子會箋》；李零，《〈孫子〉十三篇綜合研究》；徐勇，《先秦兵書佚文輯解》等著作。

衆多佚文的存錄不但爲今人恢復《孫子》八十二篇提供了寶貴資料，在某種程度上還進一步證明瞭宋代八十二篇本仍然存在，否則唐宋時期諸書大量徵引佚文便無法解釋，尤其是後來張預注釋《孫子》時所引佚文最多，更難以圓釋。

值得注意的是，輯佚工作者在輯佚過程中存在「寧濫勿缺」、過度求全求善的誤區，從而把一些非原本的資料誤補進去，在《孫子》輯佚工作中也屢見不鮮。如前集卷四，《奇兵》中有：「溪穀險阻者，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深林者，所以用少擊衆也；坳澤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通典》一百五十九卷、《長短經》均認爲是《孫子》原文，清孫星衍在《問字堂集》卷三中斷爲「俗本之脫誤」，今人楊炳安疑爲《孫子》佚文，李零直接收錄到其佚文之中。其實《六韜·龍韜·騎兵第二十七》中就有此文，只是「止禦車騎」作「止車禦騎」，「深」作「山」，缺一「用」字，而且其後仍有大段不見於《通典》的文字，這些文字從內容和語言風格上看明顯非《孫子》之文。故筆者認爲孫、楊、李等人之論不妥，非《孫子》佚文。

綜之，《總要》中的《孫子》引文對《孫子》文獻學研究發揮了重要作用。儘管作爲類書性質的軍事百科全書，其中引文多有刪改之處，但大量異文的存錄畢竟爲校勘學研究提供了豐富資料。利用這些異文，運用他校法，可以解決許多校勘問題；較多版本資料的保存爲版本學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據，不僅可以反映《總要》對待資料來源的慎重態度，還可以利用《總要》衆多的版本資料來糾正今人的訛誤；許多佚文字句的記錄爲恢復《孫子》八十二篇原貌提供了珍貴資料。因而，在對《孫子》展開相關文獻學研究時，不可忽略《總要》中所保存的《孫子》引文資料。

三、軍事思想價值

《總要》所引《孫子》之文除了文獻學價值外，還對北宋軍事思想與孫子兵學的研究產生了很大作用。

(一) 《總要》引文反映了編纂者重戰術輕戰略的主旨

《總要》作爲一部應急之作，以應付當時的具體戰事爲要務。全書除了「製度」十五卷這一傳統軍事理論之主體部分，還有「邊防」，尤其是前集卷十七的《麟府路》，前集卷十八上、下的《鄜延丹坊堡安軍路》、《邠甯環慶

路》、《涇原儀渭鎮戎德順軍路》、《秦隴鳳翔階成路》與《西蕃地理》，使當時整個西北戰區的地域之遠近，城堡戍守之要害以及西夏相關的軍事地理情況一目了然；同時，又「采春秋以來列國行師制敵之謀，出奇決勝之策，並著於篇，隨其效應，依仿兵法以分其類目，謂之故事」（後集，《原序》），以「發智士之聰明，佐將士之術略，聞一知十，觸類而長」（後集，《原序》），從而達到「彰往察來」，借鑒歷史經驗之目的。而且「制度」作為一個相對完整的軍事理論體系，不但有諸多「計謀方略」，還對「營陣法制，器械名數，攻取之具，守拒之用，並形圖繪，悉以訓釋考。」（《仁宗皇帝禦制序》）從選將到練兵，從營法到陣法，從戰地到風俗，從攻城到守城，從水攻到火攻，從器械到賞罰，逐一進行論述，幾乎涉及了實際作戰的各個方面。

筆者進行《總要》所引《孫子》原文較為詳細的統計，大致情況如下表：

篇名 字數	始計	作戰	謀攻	軍行	兵勢	虛實	軍爭	九變	行軍	地形	九地	火攻	用間	總計
《孫子》	335	335	427	300	322	583	472	240	606	543	1059	284	461	5,967
《總要》	158	54	221	78	182	88	312	102	536	377	722	163	249	3,242

註：兩書版本分別為曹注本和明正統刻本。

《孫子》十三篇，前六篇以兵略為主，後七篇以戰術涉獵較多。從該表中不難得知：《孫子》原文，前六篇共有2,302字，占整個十三篇的38.6%；後七篇共有3,665字，占61.4%。《總要》所引《孫子》原文中，前六篇共有781字，占整個所引的24.1%；後七篇共有2,461字，占75.9%。《孫子》後七篇戰術文字在《總要》所占比重大大高於前六篇兵略之文，《總要》所引《孫子》原文以戰術為主。曾公亮等人正是以這些引文為核心，進行闡釋和例解，構成了全書的主體部分。換言之，《總要》亦是以戰術為主，兵略為輔。可能也正是由此緣故才使得其理論水準較為欠缺，導致後人對之忽略和所引《孫子》之文的遺忘。

（二）《總要》引文折射出北宋軍事思想的某些積極變化

《總要》大量引用《孫子》原文及其注釋所反映的軍事思想，與宋仁宗時期主流的軍事思想不同，揭示了當時軍事思想上的某些積極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關於「不戰而屈人之兵」全勝思想的論述。此命題作為古代戰略思維的重要議題之一，本是《孫子·謀攻》篇的內容，其思想建立在「攻」的基礎之上。「不戰」的零代價是為達成「屈人之兵」之全勝目的，「利」的權衡是這一思想的根本支點。《李衛公問對》卷下有唐太宗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太白陰經》卷一，「術有陰謀」條目有：「故兵有百戰百勝之術，非善之善者也；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而宋人對此論述的重心卻發生了偏移。梅堯臣等人強調「不戰」的原因在於「戰則傷人」，並狡辯說這是為了「愛民」。這種片面強調「不戰」而忽略「屈人之兵」的解釋，顯然是對《孫子》思想的曲解，是為一直瀰漫於整個大宋王朝的怯戰、投降思想而尋找託辭。《總要》卻與當時主流相左，積極繼承並發展了《孫子》之論。書中不但言及「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後集卷一，《不戰而屈人之師》），還在後集卷一專設「不戰而屈人之師」一目，別為一門，以西漢周亞夫平叛七國之亂等四個戰例釋之。這不但是對宋代《孫子》兵學的發展，更是站在戰略高度，從深層理論上反對對少數民族政權所採取的妥協、投降路線。
2. 關於「將能而君不禦者勝」的闡述。此論作為古代兵學理論的基本觀點之一，出自《孫子·謀攻》篇，被歷代兵家奉之為經典，同時也是宋代孫子兵學爭論的主要問題之一。以宋代諸家對此所注為例：「梅堯臣曰：軍不知進退之宜，而專進退，是縻系其軍，六韜所謂軍不可以從中禦」；「自闔以外，將軍制之」。「王皙曰：縻，系也。去此患則當托以不禦之權」；「君禦能將者，不能絕疑忌耳。若賢明之主，必能知人，故當委任以責成效，推轂授鉞，是其義也。攻戰之事，一以專之，不可從中禦，所以一威，且進其才也。況臨敵乘機，間不容髮，安可遙制至乎？」「何氏曰：古者遣將於太廟，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乃複操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禦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蓋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而退。而曰，有王命也，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監軍也，是作舍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故禦能將而責平猾虜者，如絆韓盧而求獲狡兔者，又何異也。」張

預曰：「進退由內禦，則功難成」；「故曰：闔外之事，將軍裁之」。^[14]

北宋皇帝違背了這一基本原則，「將兵權高度集權于皇帝個人手中，限制甚至剝奪將帥對所部軍隊應有的指揮權」。^[15]宋太祖不僅把將校任免和軍隊調動權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且從宋太宗起還常親自制定作戰方略，授以陣圖，以便「遙制便宜」。直至宋仁宗時，在對西夏激烈對抗中，還以之為金科玉律，派「內臣監兵」，「以圖陣授諸將」。這種做法嚴重地違背了戰爭規律，扼殺了將帥指揮戰爭的能動性和統帥軍隊的權力，使其失去了自由，根本無力、無權治軍，從而造成士兵畏敵不畏將，愛身不愛將，軍令無法便行的尷尬局面，招致北宋軍隊連連慘敗。

《總要》一反祖制，對「將能而君不禦者勝」進行了較為深刻的論述。在前集卷一《將職》中不但引有此語，而且隨後還對三種「將不受命」情況加以闡釋，即「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全；可殺，而不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此三者，將之勝敗之先得也」。從而與梅堯臣、王皙、何延錫、張預等人的論述一起，重新從理論上對治軍用兵原則進行了積極認識，而與蘇軾等人所言「天子之兵，莫大於禦將」^[16]的主流保守思想形成鮮明對比。這對於革除當時的禦將之風，引導統兵將帥按照戰爭客觀規律指揮作戰，推動一度停滯不前的軍事思想繼續發展有著特殊而重要的意義。

關於「奇正」看法的論述。「奇正」是《孫子》作戰指導思想的一個核心問題，本是《孫子·勢》篇之言，前人有關論述頗多。如《尉繚子·武議》篇有：「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六韜·軍勢》篇言：「勢因敵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李衛公問對》卷上有：「故善用兵者，奇正，人而已」；《孫臏兵法》甚至還專設《奇正》篇，對有關奇正問題展開論述。

但北宋政府每次作戰，總是先授陣圖，尤其是宋太宗的「平戎萬全陣」、宋真宗的「常陣制」、宋仁宗的「八陣法」等，不僅使將帥無法靈活指揮作

^[14] 此段所引內容具體均可參見：孫武、曹操等，《十一家注孫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 70-77。

^[15] 範學輝，〈將從中禦始于宋太祖考〉，《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1（2006.1），頁 20。

^[16] 宋·蘇軾，《東坡全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107 冊，卷四十二〈孫武論下〉，頁 589。

戰，而且就其所授戰陣圖來講也極為呆板、保守，根本無「奇正」可言，從而導致實戰中的屢屢受挫。

《總要》重新認識奇正的重要性，並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總結、歸納，進一步做了詳細的論述。書中不但在前集卷四中專設《奇兵》一條目，認為「奇非正則無所恃，正非奇則不能取勝」，「奇正」廣泛體現了示形造勢的各個方面，「至其出入詭道，馳騁詐力，則勢有萬變」；還引述著名的「詭道十二法」展開論述，得出《孫子》所論「詭道」不過是「奇正」具體運用的結論。顯然，這一闡述「深化了對《孫子》奇正思想的理解，使之作為排兵佈陣及其戰術變化的範疇出現，而且成為分析和指導一切戰役戰術行動的普遍原則。」^[17]同時，又在後集卷三中設立《權奇》與《奇計》條目，分列春秋城濮之戰等17個戰例和後周伐陳等6個戰例；後集卷五中設立《出奇》與《伏兵》條目，分列秦趙長平之戰等7個戰例和晉楚泌之戰等24個戰例，來證明「奇正相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這些均對改變當時的僵死不變作戰指揮方式有一定積極作用。

另外，《總要》還重新肯定了「以寡勝眾」（前集卷三，《以寡擊眾》）、「貴知變」（前集卷四，《用騎》）、「不以冥冥決事」（前集卷四，《料敵將》）等優秀用兵思想。

上述諸思想不僅是對《孫子》積極作戰指導原則的深化與發展，更是深諳兵法的有志之士對守舊的軍事制度改革發出的疾呼。這在宋代軍事史上是難能可貴的，但北宋後來的統治者並沒有遵循和實踐這種用兵思想。

綜之，《總要》中的《孫子》引文對宋代孫子兵學發展產生了重大意義。通過對所引文字分布狀況的分析，可以發現《總要》重戰術輕戰略的編纂主旨；通過對其中字句的研究，可以反映仁宗時期北宋王朝軍事思想上的某些積極變化，在宋代軍事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惜乎，當時的統治者並沒有遵循和實踐這些思想，從而導致對外作戰中屢屢敗北，最終滅於「夷族」之手。

四、結語

學界一般將宋代《孫子》研究分為三個階段，宋仁宗中期以前為蕭條期，宋仁宗中期至宋神宗朝為復興期，北宋末至南宋亡為應用期。其中第二個階段

^[17] 魏鴻，「宋代孫子兵學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所博士論文，2007.6），頁100。

為《孫子》兵學與宋代軍事理論發展的最重要時期，可分為宋仁宗與宋神宗兩個歷史時段。具體到宋仁宗朝，其代表性事件有二：《總要》的編修和武學的設立。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五月，詔置武學于武城王廟，……。八月，罷武學」。^[18]由於一直沒有招收到武學生員，仁宗朝武學名義上僅存在三個月，而《總要》卻是在最高統治者的鼎力支持下編纂了五年時間，成文50餘萬字，實際影響顯然在當時武學之上。所以，筆者認為《總要》為仁宗朝孫子兵學復興的最主要標誌。據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總要》在孫子兵學中所占居的重要地位，《總要》中《孫子》引文對《孫子》本身及相關研究所起的重大作用。

當然，曾公亮等人以短暫的五年時間編纂出50餘萬文字，其中缺失自然不少。具體到《孫子》引文中，這種缺陷表現的也較為明顯。

其一，《總要》引文中有大量的字句訛誤。如前集卷四，《察敵形》有「輕騎先出居其側者，陣也」，各本《孫子·行軍》篇均作「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總要》與《孫子》各本差異為「騎」和「車」、「陣」和「陳」兩處。「陣」、「陳」相通，各本無誤。而「騎」與「車」之爭，則明顯是《總要》之誤。其原因在於，春秋時代主要作戰兵種是車兵，騎兵的興起出現於戰國時期，孫子所處的時代不可能有大量的騎兵部隊出現。故《總要》以「騎」代「車」，造成了引文的訛誤。

又如前集卷九，《六形·掛形》有《孫子·地形》篇語：「我可以往，難可以退，曰掛形。」此言與《孫子》各本差異較大，如「掛」，曹注、武經本作「掛」；而「難可以退」，《通典》、曹注、十一家注、武經本均作「難以返」，從語義上看《總要》明顯有誤。

其二，《總要》所引資料基本上均未著明出處。這些資料來源現在大多已亡，這就給相關研究造成了極大困難。當然，這對於《孫子》引文來說影響有限，畢竟其所引之書原文只有六千餘字，研究者完全可以做到熟記於心。

除了上述文獻學方面的缺失外，《總要》流露的保守軍事觀念也還比較突出。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仁宗皇帝禦制序》中以「戡亂」為首，「禦侮」為次，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主體基調；卷四《用騎》「騎者，軍之伺候也，所

[18]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崇儒三〈武學〉，頁2221。

以擊便寇，絕糧道也」，輕視騎兵的戰略誤導；卷七《陣法》、卷十《攻城法》、卷十二《守城》所反映的消極防禦戰術思想。由於這些內容不屬本文研究範圍，故不贅述。

上述缺陷，對於《總要》引文來講是難以回避的，進行相關研究時也須格外謹慎小心。但對這些弊病產生的原因及所造成的影響進行分析，就不難得出「瑕不掩瑜」之結論。後人因此而忽略《總要》及其引文大為不妥。首先，宋代文獻學最為顯著的特徵就是重義理而輕訓詁，大量的義理闡發就會導致出現某些文獻錯誤。以文學起家的曾公亮、丁度等人在「文人論兵」的大環境下編修《總要》，受此影響在所難免，造成一些訛誤也有情可原。況且其中許多文獻訛誤本身還並非宋人所為，而是在後來流傳中造成的。其次，類書本身是一種博采四部，對各門資料分門別類加以輯錄的工具書，節引、改易、增刪之處非常多。這些資料未必盡可據，但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古書的真實面目，對古籍的研究有著重要作用。此特徵應用於作為軍事百科全書的《總要》也是十分適合的。再次，《總要》畢竟是官修兵書，主要還是反映當時主流的軍事思想，統治階級的守舊觀念仍佔據主體地位，能在主流思想之外提及、論述大量積極而重要的用兵思想已確屬不易。據此而論，《總要》存在的上述問題和缺陷也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參考文獻

- 王家祥。〈大通上孫家寨漢簡孫子研究〉，《文獻》，1：1（2000.1），頁40。
- 吳九龍著。《孫子校釋》（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
- 宋·王應麟。《玉海》（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946冊，卷一百四十〈孫臏兵法〉，頁692。
-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三百四十一。
- 宋·趙希弁。《郡齋讀書志》（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74冊，後志，卷二〈王皙注孫子三卷〉。
- 宋·蘇軾。《東坡全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07冊，卷四十二〈孫武論下〉，頁589。
- 李零著。《〈孫子〉十三篇綜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於汝波著。〈歷代研究〉，《孫子兵學大典》第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63。
- 孫武、曹操等。《十一家注孫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崇儒三〈武學〉。

楊炳安著。《孫子會箋》（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三十。

範學輝。〈將從中禦始于宋太祖考〉，《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1（2006.1），頁20。

魏鴻。「宋代孫子兵學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所博士論文，2007.6）。

The Study on *Sun Zi* of *Wu Jing Zong Yao*

Xin-wei Li

Abstract

Wu Jing Zong Yao was the first government official encyclopaedia of military affairs in Archaian china. It quoted many original words of *Sun Zi*. They did not only work out some questions of collation but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s on edition and some rare data on comeback of *Sun Zi*, and corrected many correlative mistakes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t the same time, those citations embodied much development of sunziology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It also reflected some obvious changes of military ideas in this time. *Wu Jing Zong Yao* therefore was possessed of supernal stat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unziology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quoted passages reacted strongly on *Sun Zi* and correlative study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words (關鍵詞) : *Wu Jing Zong Yao* ; *Sun Zi* ; Quoted Passage ; Philology ; Military Idea

《武經總要》；《孫子》；引文；文獻學；軍事思想

Xin-wei Li : Lecturer, Beijing People's Armed Police Command College ; E-mail: general76@yahoo.cn